

两会也是一种民主示范

雪梅视点

开微博的代表委员们，估计得有些心理承受力。几千人的大会上，你提了什么建议，发了什么言，说了什么话，除非被记者逮着了，一般不太会被广而告之。即便是被传统媒体报道，通常也是单向度地传播，不认可你观点的人，很难和你面对面地辩论；极端的反对者们，也不会指着你的鼻子骂。微博不同，它会迅速被传播扩散，“好事者”还会直接评论、责难甚至谩骂。这多半会让一些人不适应，愤怒和委屈：我没说错什么呀，怎么就遭骂？

其实，两会需要一些对新媒体的认识。比如，微博的益处——参与者众，

传播迅速，便于沟通，符合“议政”的需要。本来就是一个讨论国计民生的会，要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发表意见；让更多的利益被表达，多元的声音被听见。多一些议案提案，多一些争论和质询，多一些探讨和争辩，议政才有质量和深度。不是每个议案、提案，每个代表委员的建议都无可辩驳，只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来自场外的不同声音——如果不是面对面，它们更像是自说自话，而不是交锋。议政的关键在议，因而，不怕交锋相对、咄咄逼人，就怕沉默不语、视而不见。当然，两会上的交流碰撞，并不像微博上那么简单，一个“顶”或者转发，就是一种态度。它需要争论的各方都言

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对于代表委员而言，你提出的议案、提案、建议、意见，要有事实依据，有调研，有论证。

一些问题，可不是拍拍脑袋想一下就能弄清楚，要有让人信服的数据，不能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要有事实的支撑，甚至理论依据。简单地表达观点不难，要将观点阐释清楚，并且赢得支持，可没那么简单。

有质量的沟通，不是轻巧地赞成或反对，也不是语出惊人、一锤定音。为什么支持，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有哪些论据做支撑，可供参考的案例和数据由何而来，是否经得起推敲……这些思考和论证，是有价值的论争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于一个公民素质尚在培育中的社会而言，两会上的交锋和碰撞，也是一场“辩论课”，示范公民社会所必须的一些素养。的确，民众们还不太擅长表达意见，不太擅长讨论和争辩。很多人都熟悉微博上的“口水战”。比如你说我相房价会降低下来；对方说，降不下来，然后，争辩就不是房价降不降的问题，而成了划分敌我，站队贴标签。一个问题一旦定性，就不需要讲理，不需要讨论了。讨论也深入不下去，你都是“汉奸”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谁还听你说？

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淹没了公共讨论的理性。所以有人说，微博不是讲理的地方，捎带着，连民意也受伤害。以为民意时常是激情的，什么事一经民众讨论就乱套，以至于诸多信息被当作秘密，因为“单纯公开数据会引起恐慌。”

真的是民众不讲理，还是他们缺少足够的公共生活空间，没有学会理性地辩论？如果社会由一群不会讲理、缺少公民素养的人组成，哪里会有我们期许的民主政治？

就这一点而言，两会是在给公众演示一种民主生活的范式。开会的规则，代表的选举，议程的设置，辩论的方式，表达的技巧……所有这些，都是在给公众做示范。两会的开放度越来越高，代表委员们的会上表现越来越多地被关注，交锋碰撞得如何，发言论争有无意义，是在探讨真问题，还是做伪思考，都会给社会传递一定的信息，进而影响民众的政治观念。

冯雪梅

微言大义

制度反腐才是治本之策

在全国人大代表胡克：从历史看，“运动式反腐”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终究难逃“人去政息”；从现实看，网络反腐呼声很高，但频频遭遇缺少制度支撑的瓶颈；从国外反腐经验看，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唯有把群众的反腐热情和巨大能量纳入制度的轨道，推进反腐制度建设，才能釜底抽薪、直指要害，持久发挥遏制腐败、打击腐败的有效作用。

外来人口有权分享教育资源

在全国人大代表张淑琴：一个城市的发展，有本地居民的贡献，也有外来人口的奉献，我认为他们的子女有权利享受这里的教育资源，也有权利在这里高考，当然可能现在刚刚推行这个政策，要有一个过渡，比如必须接受几年的教育，假设没有任何门槛，随时都能来，短时期内也不好实现。

保护耕地不能重数量轻质量

在全国人大代表秦光祥：当前，在耕地保护中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城市建设占用大量优质耕地，补充的往往是复垦或新开垦的中低产耕地，虽然耕地总量没减，但综合质量却下降了。耕地质量下降，短期很难恢复，我们在守住耕地面积红线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耕地质量。

特殊人群住房问题得“对症下药”

在全国政协委员李勇：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同志们，房地产降到两万一平方米，他们也买不起，而且也不可能降到两万一平方米。所以，这些人还得用别的特殊办法解决，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能一拖再拖

在全国人大代表王彪：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既有的养老制度设计不公平，更是因为再拖下去，一方面不仅公众的不满会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改革的既得利益阻力以及相应的改革难度、成本会越来越大。

政府要主动满足公众知情权

在全国人大代表陈海啸：在网络环境背景下，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是最好的处置方式。一些官员热衷于“捂”，有人说，原因在于他们对微博时代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敏感性不够。我认为还有一种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责任心不够。政府比微博慢点是可以的，但有时候慢几天，不该质疑吗？主动满足公众知情权，就可避免可能发生的舆论事件。

（实习生 卢义杰整理）

更多两会微博新闻见@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

<http://t.qq.com/cyd> 腾讯
<http://chinayouthdaily.tsohu.com/> 搜狐
<http://weibo.com/chinayouthdaily> 新浪

数字两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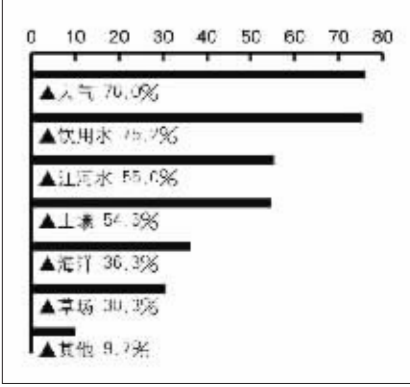
公众希望两会多关注 大气污染治理

本报讯（记者王聪聪）3月1日至3月4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调查网进行的调查显示，83.0%的人感觉自己周围环境污染情况严重，76.0%的人最希望今年两会讨论大气污染治理。关于饮用水（75.2%）、江河水（55.0%）、土壤（54.6%）、海洋（36.3%）、草场（30.3%）的治理也获得较高关注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248人参与调查，14~45岁的青年占89.1%。

在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上，71.2%的人首选“某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工业污染严重”；66.6%的人认为是“汽车增长快，尾气排放超标”；63.9%的人选择“大量企业工艺和治污设施落后”。接下来的一组数据直指环境相关部门管理责任：环境污染事故问责不够（57.8%）、环境监测和治理标准滞后（55.5%）、环境监管力度不够（54.8%）、另有36.0%的人感觉“普通人不注意环境保护”。

公众期待哪些治理污染的有效措施？调查发现首先是“对污染事故方严格问责和处罚”（65.3%），其次是“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56.7%），第三是“建立环境污染预警机制”（56.4%）。其他依次为：公布更精确的环境监测数据（52.1%）；城市规划充分考虑环境问题（48.3%）；更新汽车排放、油品质量标准（47.2%）；对社会生产进行动态调控，调节污染源总量（42.8%）；鼓励公众节能减排并参与监督（41.7%）；限制机动车，发展公共交通（40.5%）等。

你最希望两会讨论加强哪方面的污染治理？（多选）



调查设计：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
调查支持：题客调查网、新浪网
制图：杨大昕

年轻人呼唤 就业更公平

新期待

新闻背景：

2012年4月25日，山西长治公务员考录体检舞弊案一审宣判，5名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副局长赵进波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招收公务员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河北大学的应届硕士生苏晓宇最近有些苦恼。抱着20多本从校级到国家级的证书，感觉自己综合素质不错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上百份简历，竟没得到几次回复。“我真这么差吗？”他多次反问自己。

仔细研究了招录单位后，苏晓宇突然发现，有的单位根本没有公布招录程序，更别谈信息透明、社会监督了。当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究竟是怎么“死”的时候，他却亲眼目睹了身边的一位同学是如何一步步托关系进了一家好单位的。

“要不是在陪早已内定的的人‘演练’，要不是在有关系的人中间‘死去’。一次次希望，最后又一次次失望。”感慨之后，他依旧在为找工作奔波着。

苏晓宇从小在农村长大，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和背景。在他看来，找工作无论多苦、多累都没关系，但只要就业环境能够更加的公开、公平、公正，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哪怕只有一次”。

笔者发现，不少受访的大学生都表达出对就业公平的期待。

事实上，就业公平并非“招录单位不违纪”那么简单。河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秦殊芳表示，一些单位甚至是政府、事业单位的招录也开始带头搞“就业歧视”，设置学历、毕业院校、身高、户籍等令人“诧异”的条件，性别歧视也比比皆是。“有的单位，甚至连一些极其普通职位的‘门槛’也能把不少学生‘踩死’在脚下，单位的门口你都进不去。”

如今，苏晓宇已经不敢再奢望绝对的就业公平了，但令他不服的是，他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人连一个最起码公平竞争的机会却也很难得到。

（实习生 张红光）

政协委员回应：

“我国正处于就业高峰期，需要职位与求职者的差额比较大，用人单位有很多挑选的余地。这是人口结构以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就业不公的问题离不开整个大背景。侯欣一关注过不少就业歧视的案例，他发现，“就业歧视”正在从个案问题向制度性问题转变，有的用人单位甚至毫不掩饰地在招录公告中限制特定人群报考。“这是法制建设落后的表现。很少有国家已在宪法里讲明了公民的权利，但在就业录用方面却进行公开的歧视。”

更严重的是，由于公权力行使不规范，一些事业单位也开始针对某些人设计录用条件。这显然助长了就业公平问题的严重性。“解决的方法首先还是制度建设。”侯欣一认为，如果要求用人单位把报名者、录用过程、结果进行信息公开，可以减少一些“托关系”、“萝卜招聘”的现象。但目前，我国对该问题的惩罚力度太弱，造成违法成本太低，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侯欣一认为，当求职者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也要大胆、公开地维权，这对“就业歧视”的单位其实是种震慑。近年来，就有乙肝患者告用人单位的诉讼案例。但令侯欣一担忧的是，我们现行制度所设计的维权成本、时间成本都较为昂贵，如果没有简洁、便捷的救济渠道，就业不公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

（实习生 卢义杰 张红光）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媒体的一再追问下表示，新的国务院调控的文件，一个星期内会有详细的信息解读。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张业军刚走出会议室，就被媒体围堵在墙角，求解雾霾天气治理时间表。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要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经验与国外经验结合起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关机制、体制法制化。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对采访的记者表示，有机农产品不一定是安全、健康的。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孙政才纠正“农民代表”称呼：我们都是重庆市民

本报讯（记者张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孙政才3月3日认真地纠正了工作人员的一个说法。他在重庆团驻地看望该团的人大代表时，见到了基层代表、垫江县石岭村村委

主任刘群。工作人员介绍说刘群是一位农民代表。孙政才笑答：“我们正在城乡统筹，我们都是重庆市民！”

重庆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这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

的直辖市，一项重要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希望形成合理流动、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刘群代表告诉记者，户籍问题也是他将在本届人代会上交流的问题之一。他说，目前城镇化是一个热门话题，城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户籍制度。他建议现有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逐渐向人口登记制度转移。还要设立农民工劳动保障基金，让大家老有所养。当农民工转化成产业工人，用人单位所在地应将其纳入当地居民序列，其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应享受同等待遇。这是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前提条件。

贾康：征收房产税不存在硬障碍



两会直播间

本报记者 李松涛

从房产税扩大试点，到重申房产交易所得征收20%的税，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改革在一步步推进。

“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已经有了方向和试点。这个方向就是要对从房产保有到交易环节的所有税费进行整合。”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表示。

贾康说目前正在试通过房产税试点，逐渐建立起房产保有环节的税收体系。而到目前为止，我国房地产市场，保有环节的税收一直是缺失的。

2011年1月28日起，重庆、上海试点开征房产税。

然而，两年的试点下来，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算了一笔账，2011年，上海土地收入1491亿元，即使加上商铺、写字楼，房产税收入只占土地收入的1.5%左右，而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3.5%。2012年上海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到960亿元，房产税收入上升到2.6%，同比上升，但仍然无法满足地方公共支出所需。

重庆试点启动后10个月内主城区确定应税住房8563套，征收金额超过9000万元，与土地收入完全不成比例。

“很多人是用指责的态度看待上海、重庆的试点，说效果不好。”贾康说，但它们敢

为天下先，方向正确，采取了相对柔性切入的方式，减少社会震动，先把房产税做起来。从效果看，正面效应也在显现，比如高端房价趋于平稳，调节住房布局的意图已经有了较好的实现，也带来了政府的收入。虽然一开始这笔钱并不起眼，但其成长性可以预期。

在贾康看来，今后这笔收入会越来越多。城市化提高，城里居住的人会越来越多，房产税自然也会越来越多。

不仅仅如此，在贾康看来，房地产市场因此平稳发展，地方政府可以构建地方税体系，还会优化政府职能。

“因为政府发现这个新的财源之后，会年复一年优化土地投资环境，提高土地投资利用水平，还会配合收入分配，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贾康说。

然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房产税的征收会带来一种恐惧感，大家困惑的是，房产税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贾康说，低收入者可能感觉不到，但实际上有好处，政府筹集了一部分收入来改善他的生活。对追求享受生活质量的人来说，社会更和谐了，无形中得到了这种效应。先富起来的人，通过缴纳房产税，体现了自己的贡献和义务，想通了这一点，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先富起来的成果。这是一个共和的结果。

不过，依然有人对这个税种不满。表面看，是一些开发商反对，一些学者反对。

不受劳动法保护，白加黑，五加二这么干下来，房改之后最实惠的，就是分到一套好地段的房子。比如北京，拿到一套100多平米的好地段的房子，然后你说马上给他征税，能不马上跳起来吗？

“另外一种情况，手里有多套住房的，不一定是来路不正的。”贾康说，有的部委房改之后摸底，有的老干部手里有4套住房，不是什么钱权交易，就是有机会。结婚后分一套，有了孩子之后，再分一套，多子女的，还可以分一套。儿女大了，可能出国了，可能自己买房了，4套房都是老两口自己掌握。

这些都是以往的制度造成的，而并非钱权交易的结果。在房地产市场化多年的今天，还有一些通过灰色、黑色收入获得多套房产的人群，对房产税，他们也不乐意。

“比如房叔房婶，现在说要征税，他们能赞成吗？他们当然心存畏惧，要反对，只不过有些人不发声罢了。”贾康说。

同样任何领域的改革一样，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同样面对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中国现在可能既得利益者互相顶住了，合理地跨越这些障碍，是必须的。”在贾康看来，这些阻力是正常的，一个理性的社会环境和改革选择就是要化解既得利益，要共和，而不是要冲突。

如何实现这种共和？贾康给出的药方是，政府要尽快给社会大多数人吃定心丸。

“就是第一套房，或某种条件下，房子不被征税，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贾康说，日本对首套房就不征税，这是东方人的经验。第二套房也可以考虑给予优惠。有人说第二套房是给自己买的商



3月4日，本报记者李松涛专访贾康。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业性保险，是有道理的。但是调节高端这个原则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要理性讨论，给定心丸，调节高端，渐进摸索，通过试点，一步一步扩大。

从目前来看，附着在房地产上的税费有很多，普通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这么多税费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个房产税。

“房地产上的税费确实多，尤其是费，过多过滥。”贾康说，所以一定要整合，从土地开发开始到交易环节再到持有环节，通盘理顺关系。房产税不是突然冒出的一个东西，而是在原有税费整合结果之上的东西。

在贾康看来，征收房产税不存在硬障碍，但全面铺开还需要耐心，不会那么快。

